

教育生态视角下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构建研究*

杨姗姗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本研究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以产出高质量教材为共同目标,具有成员构成的多元化、编写实践的协同化、组织结构的专业化等显著特征。共同体的构建受到生态系统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包括统一的外语教材编写逻辑、多重能量的跨圈层流动,以及研究机构的关键协调作用。本研究结果为外语教材编写及共同体构建均提供了一定启示。

关键词:外语教材;教材编写共同体;教育生态系统;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25)03-0050-10

1. 引言

在党和国家日益重视教材研究的背景下,外语学界围绕教材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包括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的构建(文秋芳 2023)、外语教材学科体系的理论支撑(束定芳 2024)等。这些研究不仅为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未来学术探索指明了方向。然而,当前外语教材研究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研究成果较为零散,学术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本土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实践在理论化程度上仍显不足。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外语教材研究的深入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外语教材编写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推动外语教材编写理论知识的迭代更新,为中国外语教材编写提供系统化、理论化的支撑,是当前外语教材研究亟需承担的重要使命。

外语教材编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社会需求、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以及外语学习者的成长特点等多方面因素。高质量的外语教材编写难以依靠个体力量独立完成,亟需形成高效的教材编写团队或共同体。尽管中国外语界在实践层面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教材编写队伍,但针对这些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构建的实证研究仍然十分匮乏。这不仅在理论层面限制了对本土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中国特色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理论的构建,也在实践层面阻碍了优秀经验与做法的传播与推广。基于此,本文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从教育生态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外语教材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及教材管理部门提供科

* 基金资助:本研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大中小学外语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的支持。

作者简介:杨姗姗,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教材研究,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作者邮箱:shanshan-yang@fudan.edu.cn

学决策依据与实践启示,以助力中国外语教材编写高质量发展。

2. 文献回顾

2.1 外语教材与教材编写

外语教材是语言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学生获取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重要资源(田臻等 2024)。教材研究通常分为教材内容研究、教材编写研究和教材使用研究三大类。其中,教材内容研究主要关注教材的主题、语言、教学法,以及文化呈现等议题(Harwood 2014);教材使用研究则聚焦语言材料在教师教学和学生语言学习中的实际应用(Guerrettaz et al. 2022);而教材编写研究则侧重教材的编写、编辑和传播过程,涵盖编写者的设计流程、外部环境的支持或限制,以及教材行业的模式和价值观等(Carabantes & Paran 2022)。在国内外教材研究中,教材编写研究相对薄弱。李欣然和施清波(2023)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内外外语教材编写研究的现状,发现两者在发文量、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国内期刊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显著高于国际期刊,这反映了中国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战略地位。其次,国内研究主题既涵盖宏观理论探讨,也关注编写理念在具体教材中的实践落实(刘宏 2023);而国外研究则更多聚焦微观层面,如编写者在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的认知、能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等(Atkinson 2024)。最后,国内研究以思辨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国外研究多采用实证方法,且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

教材编写既是一个实操性问题,也是一个学术议题,更是教育政策落地的重要环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呼吁,应让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外语教材的编写过程(Shu et al. 2024),以打造适应具体情境的高质量教材。例如,Tomlinson (2011)研究了纳米比亚的教材编写共同体,该共同体由编写人员、一线教师、课程开发人员、出版商、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員共同组成。Tomlinson (2011)认为这种资源整合模式颇具成效,但在西方语境中,各方共同参与教材编写的做法却极为罕见,相关实证证据也较为匮乏。中国拥有整合优势资源的显著优势,可以开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项目,如外语教材的编写。《高中英语》(上外版)教材的编写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其编写过程融合了多方力量,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这一案例为研究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场域。然而,该教材编写共同体具体具备哪些特征?其构建过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关键问题仍需通过实证研究予以回答。

外语教材编写队伍建设,即“谁来编”的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束定芳(2023)总结了国内外三种教材编写队伍的构成形式:由出版社聘用相关学者或专业作者进行编写的商业组织形式;由政府直接组织专家进行编写的形式;政府联合出版社组织相关专家编写的形式。在中国,外语教材编写经历了从出版机构聘人编写、国家统一组织编写、地方政府或出版机构组织编写、引进教材改编,再到国家有关部门主导编写出版的形式演变。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教材编写队伍的建设都至关重要,学校和出版社都应该有计划地培养教材编写团队,以推动编写队伍的专业化或半专业化发展。然而,从现有国内外文献来看,针对外语教材编写队伍建设,特别是聚焦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

2.2 教育生态系统理论

生物与其栖息地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网络,生态系统的参与者通过能量和资源的有效流动共同创造价值。在教育领域,这种能量流动可以表现为知识、经济,以及价值观的流动。Autio 和 Thomas (2022)指出,生态系统具备四个显著特征,即参与者异质性、相互依存性、系统性成果,以及协调机制。具体而言,生态系统由利益相关的异质性群体组成,这些群体在生态系统中各自扮演特定角色,并通过相互依存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共同创造超越任何单一参与者所能单独实现的系统性成果。在这一网络中,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中心是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关键,它能够减少参与者之间互动的障碍,提高网络的协同效能(Falkner et al. 2018)。

生态系统理论因其强大的解释力,近年来在教育研究中备受关注。其中,Bronfenbrenner (1979)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框架被广泛运用。他认为,生态系统由多个独立的圈层构成,包括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和宏观系统,这些圈层通过与环境互动的人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生态系统理论通过使用“生态”(ecology)和“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两个术语,概念化了情境,为研究外语教学中的情境(包括外语教材编写情境)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随着社会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将“生态”和“生态系统”视为学习发生的环境。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外语教育则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分支。从这一视角出发,外语教学生态系统涵盖了教师、学生、研究者、教育管理者等多方参与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物理环境和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各种要素通过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学习的发生。

在中国,教材编写与审核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政府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课程标准,并组织教材的编写和审核。出版社则根据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组织编写团队进行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或教育管理部门还会邀请业内权威专家对教材进行全面审核。由此可见,外语教材编写是一个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出版社、专家学者等多个利益相关方。基于教育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研究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探讨其如何受到生态系统中不同参与者的影响,将有助于揭示外语教材编写过程的复杂机制。这不仅能够为外语教材编写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能够为中国外语教材建设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建议。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旨在探讨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的专业共同体构建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试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 (1) 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形成了怎样的专业共同体?
- (2) 该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受到生态系统中哪些因素的影响?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参与《高中英语》(上外版)教材编写的14位编者为研究对象。这些编者包括七位高校研究者和七位高中英语教师,他们共同参与了学生用书、教师参考书,以及练习册的

编写工作。为确保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化原则,在选择参与者时尽量考虑性别、教龄、职称、学历,以及在教材编写团队中承担的角色等因素的差异性。通过这种设计,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成特点及其内部运作机制。研究参与者的基本信息见表1。为保护参与者隐私,本文在数据汇报中均使用化名。化名中的R代表高校研究者,T代表高中英语教师。

表1 研究参与者基本信息

研究参与者	性别	教龄(年)	职称	学位	承担角色
R1	女	27	副教授	博士	副主编
R2	女	15	讲师	博士	分册主编、板块负责人
R3	女	13	教授	博士	分册主编、板块负责人
R4	女	20	副教授	博士	分册主编、板块负责人
R5	女	23	副教授	博士	编者
R6	女	24	教授	博士	编者
R7	男	12	教授	博士	副主编
T1	女	19	中学高级	硕士	编者
T2	女	31	中学高级	学士	编者、分册主编
T3	女	20	中学高级	学士	编者
T4	女	7	中学二级	硕士	编者
T5	女	20	中学一级	学士	编者
T6	男	7	中学二级	学士	编者
T7	女	16	中学高级	硕士	编者

3.2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对高中英语教材编者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他们撰写的书面反思。访谈主要围绕参编过程、个人体验与收获等主题展开,每位研究参与者的访谈时长在40至120分钟之间。研究者在征得参与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并同时记录现场笔记。录音内容转写后交由参与者进一步确认,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此外,研究参与者还撰写了聚焦其参编过程的书面反思,用以补充访谈数据,从而丰富研究视角。为实现数据的三角验证,研究者还收集了多种辅助资料,包括研究参与者参编部分的教材手稿、微信群聊记录、专家反馈材料,以及研究基地大事记(2018—2020年)等。这些资料为访谈和书面反思数据提供了补充和进一步验证的依据。

数据分析采用不断比较法。研究者首先对访谈转录、书面反思,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反复阅读,开展初步编码,识别数据中的关键信息。随后,根据研究目的对案例内编码材料进行内容和主题的聚类与提炼,逐步辨认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显著特征及构建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最后,研究者将研究发现与现有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比较讨论,进一步提炼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4. 结果与讨论

在高中英语教材编写项目中,由高校研究人员、高中英语教师、英语教研员和出版社编辑共同组成的教材编写团队,逐步发展为一个成员多元化、编写协同化、组织专业化的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该共同体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其明确且一致的编写目标:打造一套既符合国家标准、体现上海特色,又契合课程标准、贴近课堂需求的优质教材成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共同体成员需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并在研究机构的专业组织与协调下,跨越背景、角色和经验的差异,开展高效的协同合作。

4.1 多元化成员与一致性编写逻辑

首先,该教材编写共同体由外语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参与者组成,其成员具有异质且互补的专长。外语教材编写本身与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及教学实践密切相关,这种多元化的成员构成为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助于编写更符合生态效度的外语教材(Tomlinson 2011)。然而,成员背景的多样性也带来了沟通协调和决策冲突的挑战。不同成员在角色、经验和视角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意见分歧,影响编写效率和团队协作。尽管如此,数据分析表明共同体成员在教材编写的意义、目标和原则等方面达成高度共识。这种共识构成了教材编写的一致性逻辑(Autio & Thomas 2022)。高校研究者与一线教师对高中英语教材的重要性有共同的认知,例如,成员一致认为“英语教材承担着育人功能”(R5,反思),因此参与教材编写工作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R1在访谈和反思中均提到新教材对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他(主编)曾在教材编写微信群交流中指出“大面积的教改需要体现新理念的新教材来实现;新教材参考国内外课标,是新理念的凝练;严格对标新课标,有助于教师对新理念进行实践”。(R1,反思)

R1引用教材主编的原话指出,新教材的编写是推动课程改革的有力抓手。这一作用具体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通过增加开放性练习题的比例来响应“教育评价改革”(R7,访谈),以及关注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教材编写过程中,就是要非常明确地落实课改的这个动向,就是关注学生的思维发展,如何把我们的语言教育和学生的思维发展结合起来。(T2,访谈)

共同体中的多位高中英语教师持有类似的信念,即通过新教材推动课程改革的实施。此外,共同体成员还达成了一致认知,即新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有助于促进高中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

基于我自己高校教学的经验、教材编写研究的发现和思考,以及对教材作为教师培训的抓手这一作用的确信,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思辨训练)板块的设计带动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和有意识的系统训练。(R2,反思)

R2在谈及教材中思辨训练板块的设计与编写时,明确表达了新教材作为教师培训抓手的理念。一线教师同样认可新教材对教师的引领作用,例如,“我们教师用书的编写就非常强调对老师教学过程的指导。比如,一篇阅读,pre-reading、while-reading和post-reading分别应如何设计”(T4,访谈)。

其次,共同体成员对参与教材编写项目的目标达成高度共识。受访的七位高校研究者均表达了服务基础外语教育的共同目标,认为投身外语教材编写的动力源于“所有人的志同道合:大家心里,只有中国基础教育”(R6,反思)。共同体的编写目标是打造一套“既能对接

课标,又能走进课堂的教学材料”(R1,反思)。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体成员在教材编写的核心原则上达成了一致认知,形成了高度统一的逻辑框架。这些核心原则包括“基于理论”“文本驱动”和“生态效度”(R1,访谈)等。

在具体实践中,共同体以课程标准、认知语言学和教育心理学等前沿理论成果为指导,协作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如T5,访谈;R2,反思)。教材编写遵循文本驱动的原则,这要求共同体成员在选文标准上达成高度统一。选文需严格契合课程标准的主题(T2,访谈),同时确保价值导向正确(R6,反思),并具备思想性、时代性、真实性、可读性和趣味性(R3,访谈;T1,反思)。此外,语言表达需地道生动(R4,反思),单元语篇的文本类型应体现多样性(R1,访谈)。在教材任务设计方面,共同体成员秉持可操作、可评价的原则,以确保教材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我是基于文本的。先把文本里面的内容挑出来,然后基于文本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角度来设计,所以,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在课堂中实现的。(T1,访谈)

整合以前两套老教材的语法体系。在此之前有对各区教师和教研员的访谈调查,我根据这些数据提出了新教材语法体系的构建思路。(T2,访谈)

可见,共同体成员高度重视所编教材的生态效度,即教材需充分符合高中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能力(T4,反思)。从话题的选择到活动的设计,教材内容均需“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规律相匹配,既能够引发学生的共鸣,又有思维容量和挑战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R3,访谈)。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体成员需深入理解生态系统中各方的需求,包括教师、教研员、学生及教材本身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一致性编写逻辑的形成离不开教材编写项目的机制保障和宏观系统的政策支持。教材项目通过大规模调查和前沿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确保编写工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种设计不仅促进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也实现了编写各环节的有效衔接。

此外,高校与中小学力量的凝聚为外语教材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R1所言,一线老师在理论研究方面能够得到高校的支持,而高校研究者则通过教材编写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这种双向互动与合作,得益于上海市教委建立人文社科基地的举措和相关政策支持。该基地不仅为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平台,也与国家鼓励高校与中小学合作的教育政策以及上海市教委设立基地的举措密切相关,教材编写正是该研究基地的三大核心任务之一(R2,访谈)。

因此,在政策支持、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及高校与中小学协作机制的保障下,教材编写共同体的各方能够在生态系统中共存,形成合作意识,并共同应对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挑战(Falkner et al. 2018)。

4.2 协同化编写与跨圈层能量流动

教材编写共同体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多重能量的跨圈层流动,这些能量在共同体的协同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揭示,共同体所在系统中的多重能量流动主要包括经济流动、情感流动 and 知识流动。经济流动是共同体协作的重要基础,主要体现在上海市教委对教材编写项目提供的充足经费支持。这种经济保障为共同体成员持续专注于教材开发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情感流动则是共同体协作的内在动力,体现在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使命

感、情绪投入和情绪互动。正如R2所反思的,“教材要做好,需要整个团队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R5则强调了团队协作的感染力:

这次教材编写让我感觉到自己在和一群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用专业为社会服务,这也是支撑着我在高压下坚持到最后的动力。就是这股共同体的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想要不停地前进、探索。(R5,访谈)

这种团队精神和凝聚力成为共同体持续前行的内在驱动力。成员间的情绪互动也非常显著,例如,T5提到,“这种工作氛围是互相感染的,大家时刻保持精神焕发的状态”(T5,访谈)。此外,编写者还汇报了丰富的情绪体验,如“荣幸”(T2,访谈)、“纠结和困惑”(T1,访谈),甚至将编写教材的过程比喻为“做妈妈的感觉”(T3,访谈)。这些情感能量以“自豪感”“敬业态度”“凝聚力”等形式在共同体中流动。

与此同时,共同体成员间的知识互动也非常频繁。高校研究者提供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论性知识(T3,访谈),一线教师贡献实践性知识(R5,反思),教研员带来课标理论知识(R1,访谈),而责任编辑提供教材出版相关知识(R7,访谈)等。这种知识流动不仅在共同体内部发生,还呈现出动态转换和多方向流动的特征。正如T5所述,“在这个氛围当中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也把这种精神又带到了我的一线的工作当中,可以有一种辐射作用”(T5,访谈)。可见,教材编写共同体生态系统中的能量还可扩展到其他圈层(朱彦、卢军坪 2024)。

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能量的顺畅流动(Shu et al. 2023)。研究机构组织的丰富多样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教材编写共同体从生态系统的各个圈层汲取能量。例如,开展2017年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解读系列讲座,邀请教育部高中英语课标修订组专家和上海市教委教研室英语学科教研员针对高中英语新课标开展专项培训,使共同体能够有效把握宏观系统中的政策导向,从而编写出符合国家教育政策并推动教育改革的新教材。同时,举办国际会议和创办英文期刊等活动进一步拓宽了共同体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从外部系统汲取理论知识能量。此外,研究机构还组织了中小学教学调研、专家咨询、教材试用试教、封闭编写、编写座谈会、教材调研,以及与外教社联合举办教材研讨会等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和举措有效创设了能量共享网络,使教材编写共同体能够更好地吸收生态系统中的能量。

教材编写共同体能量共享网络的实现离不开高校、出版社和教委的积极参与。社会支持对于共同体生态系统中能量的有效流动,以及各方资源的共享与价值的共同创造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支持构建了一个协作共赢的生态系统,为教材编写工作的持续优化提供了坚实基础。

4.3 专业化组织与研究机构的协调作用

数据分析揭示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研究机构作为协调系统,在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了组织、管理和引领的重要作用。首先,研究机构的领导力体现在共同体成员对于研究机构及其核心团队的高度认同,尤其是对教材主编的认可。多位成员提到主编在教材编写项目中的“顶层设计”(R1,访谈)和对共同体“大方向的引领”(R2,访谈),他能够在编写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部分做出关键决策。此外,共同体的成长还得益于成员“对编写核心团队的理念和能力及品质的信任”(R6,访谈)。

其次,在组织管理方面,研究机构建立了分层而灵活的组织管理机制,确保了教材编写及团队建设的顺利进行(R5,访谈)。例如,2018年8月前后两次封闭研讨中,组织形式从模

块负责制转变为单元负责制,同时明确了分册主编负责制和板块负责制两项重要责任机制。

其中,分册主编负责统筹协调每册教材各单元的连贯性与衔接,并及时调整修改目录;板块负责人则负责细化板块要求、审读反馈,且在大规模审读反馈和封闭研讨会上汇报内容并提出修改方向。从2018年9月起,教材编写组还形成了基本的研讨制度,如两周一次的例会,以及根据临时需求增加的会议(如外教审读反馈、市教委审读反馈等)。这些制度化的安排有效保障了教材编写工作的高效开展。(R1,访谈)

由此可见,高中英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是在研究机构的专业组织与协调下有序开展的,共同体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值得强调的是,研究机构通过及时调整教材编写的组织形式,有效保障了编写工作的高效推进。R1提到的教材编写研讨制度不仅促进了编写组内部的高效沟通,还使共同体能够及时从生态系统中汲取能量,推动教材编写共同体自身的成长。

上海市的教研文化传统为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支持。例如,由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研究机构和上海市教育学会英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高中英语(上外版)教材试教调研课例研讨活动,充分体现了这一传统文化的优势。在教材编写的生态系统中,研究机构作为协调中心,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仅提升了整个系统的联合效能,还有效减少了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障碍,成为生态系统健康与稳定的基石(Autio & Thomas 2022)。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高中英语(上外版)编写团队为个案,探析了新时期中国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与影响因素。从教育生态视角理解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得到确认。如图1所示,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以产出高质量教材成果为共同目标,具有成员多元化、编写协同化和组织专业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契合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点(Bronfenbrenner 1979)。研究表明,该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具备以下四个核心要素:系统层面的成果产出、参与者的多样性、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协调机制(Autio & Thomas 2022)。共同体的构建受到生态系统内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较为突出的影响因素包括一致的外语教材编写逻辑、多重能量的跨圈层流动,以及研究机构的协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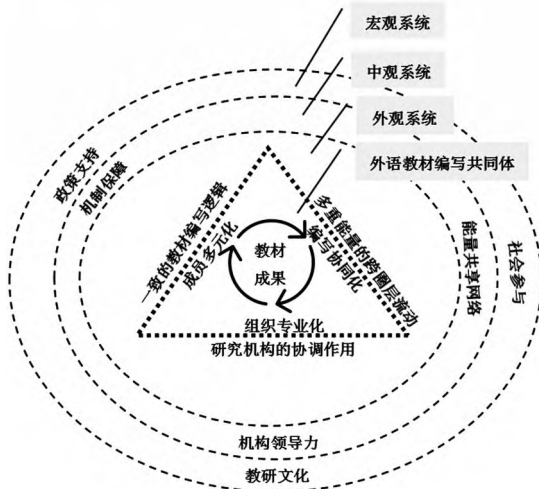


图1 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

在政策支持下,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及高校与中小学协作等机制共同确保了一致的外语教材编写逻辑。尽管共同体成员背景多样,编写逻辑各有差异,但生态系统中的 consistency 逻辑如同纽带,将编写共同体各方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一致的编写逻辑为成员创造了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减少了摩擦,使他们能够基于共同目标合作编写教材。共同体成员通过对共同创造价值的认同(即编写出一套或一本怎样的外语教材),逐步形成了一种集体身份,这种身份体现在一致的编写逻辑中。一致的逻辑不仅促进了成员间相互意识的建立,还使他们能够在协作中共同应对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挑战。因此,为了确保外语教材编写的高效开展,项目组在早期阶段需要对教材编写的目标、原则和规范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顶层设计。同时,还需通过适当的方式及时将这些理念传递给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以确保大家达成共识,共同遵循这一编写逻辑。

高校、出版社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参与创设的能量共享网络,为教材编写共同体实现多重能量的跨圈层流动提供了重要保障。要编写具有生态效度的外语教材,相关政策、理论和实践知识需在生态系统中实现高效流动。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能量共享网络,如教材编制研讨会、封闭编写研讨会、专家咨询会,以及教材试教试用等,有效促进了知识的跨圈层流动。这些活动不仅为编写共同体提供了协同合作的平台,还推动了编写工作的协同化发展。此外,教材编写生态系统中还存在类型丰富的能量流动,例如,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机构(如出版社)的经费流动,以及共同体成员间的情感互动。这些能量流动在生态系统中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生态的健康发展(Shu et al. 2023)。

教研传统与研究机构的领导力,为研究机构成为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协调中心提供了坚实支撑。研究机构的核心职责在于协调各方参与者的活动,并制定教材编写的规范与标准。这些规则 and 标准为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与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尽管在开放成员资格的情境下,协调中心的权威性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它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结构,用于指导任务的识别与分配、决策的制定,以及冲突的解决。同时,生态系统的边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如图1中各圈层的分界线以虚线表示),而协调中心的关键作用在于决定生态系统边界的渗透性程度。通过适度开放边界,协调中心能够引入外部资源与知识,促进共同体的成长与协作。专业共同体应充分认识到外部专家参与的重要性,以扩大集体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在未来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高校或研究机构应作为外语学界、外语教育界和教育主管部门广泛认可的权威机构,积极履行协调中心的职责,推动成长型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

外语教材编写项目及其共同体的构建应充分考虑教育生态系统的三个核心特点,以更好地适应并推动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首先,创新外语教材编写模式需融入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参与者。共同体成员应具有不同背景,具备互补性专长,以及形成一致的编写逻辑。这种多样化的参与者组合不仅能够整合多方资源,还能确保教材编写的协同化和专业化,从而提升编写工作的整体质量;其次,外语教材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依赖于生态系统中多重能量的互动与协同合作。教材编写共同体需要与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圈层建立深度联结,特别是高校、出版社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广泛参与。这种多方合作能够推动知识、资金和情感等多重能量的跨圈层流动,为教材编写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保障,同时促进生态系

统的良性运转;最后,我们应积极构建成长型外语教材编写共同体,充分发挥研究机构作为协调中心的集体能动性,通过协调、引领和规范制定,为共同体的发展和教材编写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Atkinson, D. 2024. Reconciling opposites to reach compromise during ELT textbook development[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5): 1976-1996.
- [2] Autio, E. & L. Thomas. 2022. Researching ecosystems in innovation contexts[J]. *Innovation & Management Review*, (1): 12-25.
- [3] Bronfenbrenner, U.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4] Carabantes, L. & A. Paran. 2022. "I preferred to take another activity from the textbook": An activity-theoretical study of learning to des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4): 659-674.
- [5] Falkner, K., R. Vivian & A. Williams. 2018. An ecosystem approach to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in computer science[J].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4): 303-344.
- [6] Guerrettaz, M., S. Mathieu, S. Lee & A. Berwick. 2022. Materials use in language classrooms: A research agenda[J]. *Language Teaching*, (4): 547-564.
- [7] Harwood, N. (ed.). 2014.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books: Content, Consumption, Productio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 [8] Shu, D., S. Yang & M. Sato. 2023. Cultivating a new ecosystem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 focus on researchers in a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jec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 405-427.
- [9] Shu, D., S. Yang & M. Sato. 2024. Marrying collective wisdom: Researcher-practitioner collaboration in developing ELT textbooks[J]. *Applied Linguistics*, (1): 41-64.
- [10] Tomlinson, B. (ed.). 2011.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1] 李欣然 施清波. 2023. 外语教材编写研究二十年:述评与展望[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4): 75-80.
- [12] 刘宏. 2023. 以国家话语培养国家意识的外语教育实践探索:基于“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的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1-8.
- [13] 束定芳. 2023. 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外语教材理论体系构建[J]. 外国语, (6): 20-32.
- [14] 束定芳. 2024. 外语教材学: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J]. 外语界, (4): 33-41.
- [15] 田臻 柯张璇 王蓓蕾. 2024. 基于英语教材编写过程的中国文化呈现及体系发展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98-109.
- [16] 文秋芳. 2023. 构建大学外语教材编写理论体系[J]. 外国语, (6): 2-11.
- [17] 朱彦 卢军坪. 2024. 生态视角下高校外语教师在教材编写中的科研与实践融合能动性探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87-97.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cosystem, p.50. YANG Shanshan

This study employ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development commun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s an ecosystem, the community is driven by the shared goal of producing high-quality textbooks and exhibits notable features such as diversity in its membership, collaboration in writing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shaped by various factors within the ecosystem, among which the most significant are the common rationale for textbook development, the cross-layer flow of diverse energies, and the pivotal coordinating role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pro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textbook development communities.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textbook development community; educational ecosystem; influencing fac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Between the World Bank and UNESCO, p.60. FANG Xiaob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ossess both internal institutional language policies and external ones at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s. Among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UNESCO is most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issues. The World Bank, since proposing its “Knowledge Bank” transformation in 1996, has also focused on education iss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ften involving language policies. A comparison of the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of the two organizations in Asia and Africa reveals differences in their policy objectives, strategic choices,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1) The World Bank views language as human capital and supports the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whereas UNESCO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language and supports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2) The World Bank’s language policy emphasizes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with its education projects providing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rove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contrast, UNESCO, as a leader in global language policy, is renowned for its active advocacy of linguistic diversity; (3) The World Bank primarily focuses on enhancing learners’ professional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id projects, whereas UNESCO concentrates on protecting linguistic culture and ensuring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girls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oth organization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lack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sufficient language education resources, low cost-efficiency, low participation from member states, and a lack of policy flexibility. This study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for research on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demonstrating that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are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ntra-regional state interactions but are also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yond the reg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 language policies; UNESCO; World Bank